



莫言近照 (杨云雷 摄)

令莫言怀念的文学批评去哪了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吉祥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成了文学批评界的宠儿，“莫言评论”成为这两年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16日下午，莫言和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对话，一位学生问他如何看待批评的声音。“莫言很客气，感谢了文学界的关注，说会从善如流，但也希望评论界不要再关注他已经出版的作品了。”山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马兵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在当天上午出席山东大学第三期文学大讲堂时，多数时候看上去有点疲惫的莫言，却在讲述1988年9月那场为他而开的作品研讨会时，表现出了难得的兴奋。彼时，莫言只有33岁。3年前的1985年，他刚凭借《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当文坛都在震惊于一位文学天才的诞生时，莫言又在1986年推出中篇小说《红高粱》。

此后，莫言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1988年初，他推出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这部作品日后得到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青睐，直接促使后者决定将莫言推向世界。文学批评界也注意到了这位青年作家。1988年9月，国内50多位专家、学者聚首莫言老家高密，召开莫言作品研讨会。当然，会议也少不了主角莫言。16日上午，莫言挥舞右手，微笑着回忆：“那个时候我33岁，正是人生好年华。”

研讨会开得热闹，但在与会的贺立华教授眼里，莫言如他的笔名一样，多数时候只是认真听取专家的评论和建议，并不作声。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至今记得当时莫言和批评家之间展开的热烈互动，“白天讲我们对他的看法和理解，晚上我们听他讲，讲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讲他怎么挨饿，讲他怎么偷看闲书，讲他怎么四处打零工，讲他怎么到部队。”

研讨会开了3天，预算5000多元钱，这笔“巨款”让莫言和组织者愁得抓耳挠腮，最后是莫言找到高密一位领导，请他出面才解决了经费问题。“现在，别说5000元，5万元也不算是个问题。”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莫言再也不用为研讨会的经费犯难，但当年研讨会热烈的气氛只能成为回忆了。会议的诸多场景现在仍时不时在他的脑海中“活灵活现”：大家并不是都在表扬，也有很多人批评，“而且有很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让莫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批评家，他对莫言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被批评的莫言不觉得这是冒犯，也没有视之为对他作品的亵渎。相反，他认为这种批评非常有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在一个受尊重的、具有学术氛围的研讨会上，大家才可以讲出一系列很真诚的话”。

研讨会结束后，《文史哲》杂

志刊发了“莫言创作研讨会综述”，从中可见当时与会者的各种“辣评”。与会者从文化的角度，批评了莫言的“祖宗崇拜”意识，认为“祖宗崇拜”情结的升华，虽然赋予了莫言小说独特的情韵和魅力，但把它当作自己独特的救世良方，却表现了莫言在文化选择上的偏颇。

“现在的批评生态和以前不一样了。”马兵感慨，文学批评早已被“人情文化”、“圈子文化”侵蚀。一个让马兵感到不大能理解的现象是，多数文学批评家只要谈起当代文学的状况，几乎都不满意，“批评当代文学缺乏优秀作品，赶不上外国文学和现代文学”；然而，当这些平时批评当代文学的人聚在某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或是发布会上时，“都心照不宣地说作品很优秀，一团和气”。与“一团和气”相对的是，一些批评家为了博人眼球，对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进行完

全否定性的、抨击性的“酷评”，“看上去很尖锐，其实很偏执”。

巨大的反差之下，马兵怀念起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氛围。从“文革”中走出的众多老作家重拾笔和纸，继续着文学创作；莫言、余华、苏童、韩少功等文学青年才俊也不甘示弱，佳作不断。“当时文学批评的氛围也非常好，批评家和作家互相促进。”最令马兵津津乐道的是，30年前的1984年12月，一批当时最为活跃的作家、评论家聚首杭州，围着煤炉，讨论着小说“写什么”以及“怎么写”。在这场名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务虚会议上，“寻根文学”这一概念萌芽，如今，“寻根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文学史的注脚。30年前的这场会议也因其重要影响，日后被简称“杭州会议”。

“改变文学批评现状的关键，是要重建批评伦理。”马兵说，这需要向前辈们学习。

“世界公民”勒克莱齐奥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吉祥



勒克莱齐奥近照 (杨云雷 摄)

用勒克莱齐奥老友许钧教授的话说，勒克莱齐奥“很潮，很酷”。16日上午，这位74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席与莫言的对话活动，黑色外套搭配蓝色牛仔褲，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这是勒克莱齐奥与莫言的第二次见面，今年8月中旬他与莫言在西安一起出席活动，莫言全程被四方来访者包围，在当地媒体的报道里，勒克莱齐奥却“很清闲”。显然，这位外国作家的“辨识度”并不高。不过，在中国的文学圈里，勒克莱齐奥已经是一位老熟人了。早在1983年，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就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他第一部被引进中国的作品。2011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年后，勒克莱齐奥应邀出席上海书展，据称他一口气签了1200本书。

轻视批评家 从不出席作品研讨会

勒克莱齐奥喜欢冒险与旅行，曾在墨西哥、韩国、美国等多个国家讲学，这也恰如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在介绍他时说的：勒克莱齐奥先生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世界公民，一位心灵的旅行者、精神的游牧人。现在，他每年有三个月出现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为学生开一门《文学与电影：文学与艺术的互动》课程。许钧教授说，勒克莱齐奥经常光顾南京大学的食堂，爱吃米饭，偶尔也会来一碗面条。在未跟许钧商量的情况下，勒克莱齐奥偷偷买了一辆自行车，让许钧很担心他的安全。“后来这辆自行车被偷了，我也很高兴。”许钧说完，接着又将这句话翻译给勒克莱齐奥，老爷子略显无奈地摊开双手笑了笑。

勒克莱齐奥去年给学生开的课程是《文学与艺术的多元尝

试》，有一位学生的作业让他非常满意。勒克莱齐奥爽快地给他打了100分，许钧认为文科的作业打满分不大合适，便和他商量，勒克莱齐奥坚持己见，并以自己的经历解释：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文科就是得了100分，而我理科的成绩不好，如果没有这100分，就上不了大学。

对文学批评，勒克莱齐奥也有自己的看法。16日下午，谭好哲教授问勒克莱齐奥，他和法国创作界如何看待理论批评与创作的关系？勒克莱齐奥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了屠格涅夫的一篇小说。在屠格涅夫的这篇小说里，一位作家正在咖啡馆写作，外面突然有两个人打了起来，其中一人岌岌可危，咖啡店伙计要出去帮助弱者。这时，作家说：“不必出去，挨打的那个是批评家。”勒克莱齐奥以此故事表明他对批评的轻视。担当勒克莱齐奥翻译的许钧教授补充解释，勒克莱齐奥从不参加他作品的研讨会，也不会去看各种评价他作品

的批评文章。“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全球有上百篇博士论文是和他的作品有关的，但他从来不看。”许钧说。

哪里是故乡 法语是他唯一的国度

与批评家划清界限的勒克莱齐奥，一直保持了自己创作的个性，从1963年凭借《诉讼笔录》年少成名起，勒克莱齐奥颇有佳作问世。作为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勒克莱齐奥，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说，勒克莱齐奥将多元文化、人性和冒险精神融入创作，是一位善于创新、喜爱诗一般冒险和情感忘我的作家，在其作品里对游离于西方主流文明外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性

进行了探索。

虽然勒克莱齐奥被认为是法国作家，但他更是一位“世界籍”作家。除了中国，勒克莱齐奥长期居住在非洲，也曾游历世界各地感受风土人情。他经历过墨西哥的政治动荡，也在韩国与大学门口卖烤串的小贩交朋友。他的漂泊似乎在出生时便已注定。他的父亲是英国人，“二战”期间在尼日利亚做医务官，会说英语、法语和当地的克里奥尔语；他的母亲是毛里求斯人。战争拆散了他的家庭，幼年的勒克莱齐奥与母亲和祖母住在尼斯乡下，一枚从天而降的炸弹成为他日后挥之不去的记忆。

勒克莱齐奥曾在一次受访时说，独特的身世让他觉得自己有三个“故土”：法国、英国和毛里求斯，但他更愿意将故土作为一个精神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法语可能是我唯一真正的国度”。

2004年，勒克莱齐奥创作了半自传体小说《非洲人》，在序中，他这样写道：很长时间，我都

梦想自己的母亲是个黑人。当父亲到了退休年龄，回到法国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却发现他才是非洲人。对于我来说，这曾经非常难以接受。我必须回过头，重新开始，试图弄明白这一切。为了纪念，我写了这本小书。正是在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现在，这份记忆不仅仅是我的记忆，它也是在我出生之前的时光的记忆。

该书翻译，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袁筱一在评价《非洲人》这本书时写道，这是一次对过往的回溯，对他来说，非洲既是初生之况味的试炼之地，更是兜转徘徊、纠结怅惘的失落之所——在他大多数创作中缺席和沉默的父亲形象，终于在这部回忆录中姗姗登场。

在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表示不会因为获奖而放弃长期居住非洲的计划，他捍卫非洲文学，曾在一份提倡“全球文学”的宣言上签名。

勒克莱齐奥简介：

法国著名文学家，是20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现今法国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在1994年法国读者调查中，勒克莱齐奥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勒克莱齐奥代表作品有《诉讼笔录》、《寻金者》、《罗德里格岛游记》、《战争》、《乌拉尼亚》、《看不见的大陆》、《巨人》等。

勒克莱齐奥与中国文化界保持着长期的交流，他特别推崇老舍先生，曾为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法译本作序，题目是《师者老舍》，并任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名誉教授。